

魏秋玲 主编

国外 青少年价值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外青少年价值观

魏秋玲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国外青少年价值观

魏秋玲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1202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1.5印张 298千字

印数0001—1500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96-1/G·52 定价: 6.90元

前 言

1986年至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文献情报中心的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承担了一项国家“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演变。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汇编了这本有关国外青少年价值观的专集。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有关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演变、中国青少年社会问题和中外青少年价值观比较的专集。

本书共分四章：青少年政治观与国家观；文化变革与青少年问题；青少年教育与就业；青少年与家庭的关系。这四章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现代化过程中青少年价值观的演变。各章所汇编的有关论著，都是近年来国外专门从事青年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国际社会学协会新近召开的青年问题研讨会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著名社会学论著和期刊中挑选出来的。具体地说，除书中已注明出处的论文之外，有4篇论文（《欧洲学者的青年研究观》、《青少年保守主义》、《工作在女青年生活中的意义》、《男孩的非正式群体与职业道德》）是从J.黑兹坎普、W.米斯和Y.蒂普尔合编的《欧洲青年研究论文集》一书中挑选的，该书是黑兹坎普教授于1988年10月在联邦德国埃斯林根国际青年问题研讨会上送给编者的，当时我们曾讨论过出版《国外青少年价值观》中文版和《中外青少年价值观比较》中、英文版的问题。《欧洲青年研究论文集》共有15篇论文，是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青年研究学者近年来心血的结晶，该书由自由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引起了世界各国青

年问题学者的普遍关注。

本书收编的其他论文是编者于1987年9月出席联邦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年研讨会期间收集的，该会是由国际社会学协会青年社会学委员会和家庭研究委员会联合举办的，论题是“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其中有许多论文都是从未发表过的，代表了与会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

本书中所选论著的作者，既有原苏联、波兰等国的，也有美国、西欧等国的，还有几篇论文是由国内学者撰写的。

总的说来，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重视青年问题的研究，前者所提供的研究人力和财力也远远超过后者。因此，本书汇编的绝大多数论文之作者都出自发达国家。可喜的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重视青年研究了，而这与联合国将1985年定为国际青年年是直接有关的。

汇编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各国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旧价值观冲突，以便为我国的青年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30多名译校者和研究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作为该书的主编，我在此特向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译校者和撰稿者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辑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些差错，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魏秋玲

1992年6月18日

导 论

青少年永远是新人类

——当代国外青少年研究概况

魏秋玲

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标志。正是在战后，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才在许多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家庭社会学的蓬勃发展，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一般说来，青少年研究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才引起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

60年代后半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这类运动主要是由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发动和参与的。青年运动不仅令政界触目惊心，而且使社会各界都感到“后生可畏”，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正是青年人自身的运动促进了学术界对青少年问题的研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国际社会学协会于1949年成立。1970年8月，在国际社会学协会召开的第7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R.科尼格的带动下，成立了一个有关

青年与变革问题的讨论小组，该小组主要讨论以下两个课题：

1.对60年代后半期的青年运动进行客观的分析，并科学地评价青年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2.从理论和方法论上探讨研究青年问题的必要性，并试图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系。

197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题为“青年、教育、参与、流动性”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突尼斯、西班牙、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代表，大家都很热中于在国际社会学协会内下设一个青年问题研究委员会。

1974年8月，第八届国际社会学大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召开，会上专门设有“青年问题”讨论小组，重点讨论了以下3个论题：1.青年的社会和政治状况；2.矛盾、社会冲突与青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3.青年人的需求与抱负之间的关系，科技革命影响下的社会结构类型。日本、伊朗、原苏联、美国、印度、西班牙、保加利亚、德国等国都派有代表参加上述讨论会。

1975年5月，经国际社会学协会执委会批准，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列为第34研究委员会。自该委员会成立以来，国际学术界关心青年问题的人士愈来愈多，有关青年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也很活跃，例如，1987年9月，国际社会学协会家庭研究委员会就曾与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合作，共同召开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东道主是设在慕尼黑联邦德国青年研究所，该所已发展成西方影响最大的青年研究机构，尤其对西欧的青年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1970年以来，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每年都在保加利亚的普里莫索召开国际青年问题讨论会，并经常出版《青年问题简报》（俄文版）。1987年，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了《当代世界青年问题》论文集（英文版）。设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青年研

研究所已发展成为原苏联和东欧研究青年问题的中心，并起到了沟通东西欧青年研究的桥梁作用。

1983年6月，原苏联、东欧、古巴、蒙古等国的一百多名学者在德国莱比锡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论题是“青年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该会议是由德国中央青年研究所承办的。

自1981年以来，国际社会学协会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开始出版有关青年研究的《简报》。1983年，该委员会在保加利亚的普里莫索召开会议，按照国际社会学协会的新章程制定了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章程。该委员会的现任主席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J.哈特曼博士，在他的倡导下，该委员会已发表不少研究成果，如《青年与社会的结合》(1984年)，《福利社会的青年》(1984年)，《民主青年参与社会之观念》(1984年，1985年)，《欧洲青年——从上学到就业》(1985年)，《农村青年——昨天、今天与明天》(1986年)，《当代世界青年问题》(1987年)，《欧洲的青年研究》(1988年)。1989年，德国青年研究所出版了《青年与家庭论文集》。

由于联合国将1985年定为“国际青年年”，促使更多的国家重视青年研究。近年来，青年研究的课题愈来愈广泛，大到青年的国家观、世界观、政治观，小到青年人怎样利用闲暇时间、年轻人与父母共进晚餐的意义，都有专家学者们在悉心研究。

论及世界各国对青年人的看法，可分为乐观派与悲观派两大类。乐观主义者往往把青年看作人类的希望，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代胜过一代；悲观主义者出于对当代青年问题的忧虑，往往将青年与暴力犯罪、恐怖活动、吸毒贩毒、道德败坏等等相联系，认为一代不如一代。我个人认为，乐观派的观点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拿如今风靡全球的迪斯科音乐和舞蹈来说吧，最初是青年人开创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进而发展到自己也着了迷，并以健身为由翻出了“中年迪斯科”、“老年迪斯科”之类的新花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老年人往

往也情不自禁地在赶时髦，而且赶的是对青年人来说已经过时的时髦了。悲观主义者的论调常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这个形象，“一代不如一代”正是她的口头禅，在她看来，子孙们由她出生时的9斤下降到7斤、6斤，当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但这很可能是秤的问题，也就是说，衡量的标准不同罢了。

近年来，一些国家青年研究中出现的“新人类观”也体现了乐观派与悲观派对青年褒贬不一的状况。乐观主义者认为，与其说现在的青年人不如过去的青年人，还不如说现在的青年人是新人类，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反传统。即使是一个极端厌恶年轻人的老顽固，在他临终时也往往会给年轻人留下遗嘱，这本身就意味着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一般说来，老年人和中年人都很容易看不起青少年，说他们“不听话”、“调皮捣蛋”、“与我们年轻时不一样”……这类悲观的论调确实地反映了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也确实是值得成年人的社会予以高度重视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青少年不保守，勇于创新，在本质上是强于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他们是最活跃、最有生气、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社会群体。中老年人如果经常与青少年接触，积极参加青少年的活动，就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一些，从而减慢老化的过程，甚至延年益寿。就从事青少年研究的社会学家而论，他们往往都是热爱青少年的。事实上，经常从事青少年研究和青少年工作的人比其他社会群体的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从而也就更容易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以上是就当代国外青少年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作了一些评介，下面我想举例说明一些国家和地区青少年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日本的11国调查与欧洲的10国调查

1982年,“欧洲公共舆论”对法国、荷兰、丹麦、英国、希腊、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爱尔兰、联邦德国共10个国家15—24岁的青少年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个人生活、兴趣与观点;②社会与政治观;③对自然保护、生态平衡、反战运动、反核武器运动、反对建设核电站等政治运动的态度。

1983年,日本对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瑞典、巴西、菲律宾、南朝鲜、德国、南斯拉夫共11个国家18—24岁的青年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①个人生活、生活目标及其观点;②对国家与社会的态度;③对工作的看法。

以上两项调查共涉及18个国家,对世界范围的青少年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期出版的国际社会学主要学刊——《国际社会学》已发表美国两名学者R.布朗加特和M.布朗加特所写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青年问题与政治”,对上述两项多国比较调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们认为,各国青年尽管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在很多观念上却都有着共同之处。总的看来,80年代世界青年的个人生活、社会态度与政治状况具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①大多数青年在向成年过渡时期处于稳定状态;②青年人都在生活中寻求更多的独立性;③青年人对当代政治问题和政治运动都很关心,各国青年社会观和政治观的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要多。研究表明,各国青年仍然是相当稳定和忠实的公民,多数青年满足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反对在全球不负责任地扩散核武器和破坏自然环境,并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这类全球性的公害。R.布朗加特和M.布朗加特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上述特点表明:政治社会学中的世代理论和社会化理论还是站得住脚的。总之,这篇研究报告引起了许多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兴趣,无论他们是否赞同作者的结论,他们全都认为:进行多国青年比较是值得

提倡的。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各国人民之间的通讯联络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多数国家都已向外界开放，世界变得愈来愈小，各国青少年之间的信息沟通愈来愈快，无论是青年运动还是流行歌曲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和影响程度都是愈来愈大。这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因为在通向未来大同世界的坎坷旅程中，各国文化趋近的现象必将长期存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青年文化的趋近又必然会处于领先地位，举例来说，近年来迪斯科旋风席卷全球就是一大证明。当然，人类不是只按年龄段来划分的，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都有种族、阶级、贫富的差异。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和阶级的烙印，但相对于中老年人的文化现象来说，所谓青少年文化也还是存在的。如今，已有一些国家的学者正专心致志于青年文化与成年文化的比较，研究青少年与文化的关系，法国甚至成立了“青年与文化俱乐部”。此外，好些青少年组织热心为年轻人安排旅游计划，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社会的文化。

美国的青少年研究

美国学者对青少年的政治观、青年文化的特点、青年的婚恋观和家庭观、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年就业与失业问题、青少年社会化等等都作了不少研究，在此仅举一些研究成果予以说明。

美国青年的失业率是较高的，18—24岁青年的失业率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要高出1倍，黑人青年失业率高达50%，就笔者访问过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而论，男青年的失业率甚至高达75%。因此，一般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青年人最担心的是失业问题，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青年把通货膨胀、国际问题、能源问题

看得比失业问题更重。在担心国际紧张局势的人中，青年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的人。这表明青年人并不如人们通常所想的那么自私，他们对国际政治问题显然看得比个人切身利益更为重要。

调查表明，美国青年害怕核战争的程度甚至要比自己死亡和双亲去世还要厉害得多。49%的青年认为，美国的国防和军事费用开支太大，用于社会计划的费用太少。此外，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制度怀疑的程度也比其他年龄组的人高一些。在问及“是否以自己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的问题时，青年人给予否定回答的比例也明显高于老年人。美国青年对两党轮流执政持极大的怀疑态度，在18—24岁的青年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参加了上届总统大选。

在分析美国青年一代的独特性时，研究人员发现，25—29岁的青年群体总是成为最重要的年龄群体，他们是所有青年人中影响最大的群体。这一发现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呢？暂时还不清楚，只有在世界各国都重视青年研究之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美国学者在调查研究中非常重视方法论问题，例如，调查美国青年的民主倾向时，并不单刀直入地问“你是否赞成民主？”而是就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来探询青年人的民主倾向。例1是问“你是否赞成允许共产党人上大学？”回答表明，18—24岁的青年赞成的比例比65岁以上的人高出30%；例2是问“你对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的法律是否反对？”回答表明，20—29岁青年人的反对比例要比70—79岁的老年人高出46%；例3是问“你是否赞成白人和黑人同进一所学校读书？”回答表明，尽管25—29岁的青年人与65岁以上老年人表示“赞成”的比例都很高（分别为93%和73%），但前者仍比后者高出20%。以上结果说明，美国青年的民主意识比老年人更强，表态也更积极。不过，在轻信新闻报导的宣传方面，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轻信，这反映了年轻人因缺乏经验而

在识别能力上低于老年人的状况。

正如同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战后处于领先地位一样，美国的青少年研究也别开生面，不仅在理论研究和实际调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且开始重视青少年实际工作，例如，有些专业研究人员和志愿工作人员在做流失街头青少年的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一些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经常去附近的青少年拘留所作感化和帮教工作。

德国的青少年研究

德国政府对青少年研究和家庭研究都很重视，在人员和经费上都考虑得很周到，每年发表“青年问题报告”和“家庭问题报告”。一些公司企业也大力资助青少年研究，社会各界也很关心青少年问题。近年来，德国经常召开有关青少年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已举办好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得都相当成功。设在慕尼黑的德国青年研究所举世闻名，人才济济，经费充足，除研究德国的青少年问题之外，还开展跨国比较研究。该所非常重视青年政治观的研究，并定期对该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犯罪问题、家庭问题等等作出评价。

战后，美国在德国设有驻军，例如，斯图加特就设有大兵营，那儿戒备森严，令德国人反感。但是，德国人对美国文化却不反感。美国人在战后着重改变德国人的文化观，大量输入美国文化，用民主、自由、米老鼠、唐老鸭、牛仔服、迪斯科、摇滚乐、可口可乐、苹果馅饼、好莱坞电影、麦克唐纳快餐来抵消纳粹主义的影响。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美国和德国在战后由敌对国变成了同盟国，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人是靠青年文化来战胜的。如今，多数青年都与纳粹主义毫不相干，顽固派和战争狂也很难在青少年中重新鼓动起纳粹精神，但在老年人中，

纳粹党徒和反犹太人分子依然存在，他们过去所受纳粹主义的影响太深，身世也不如青少年那么清白，一有风吹草动，很难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战后，西方世界弥漫着仇视共产主义的情绪，美国人乘机用“反共”的宣传取代了“反犹太人”的宣传，同时还将一些纳粹分子改造成了教授、学者、科学家，物质上给予优厚的待遇。美国政府考虑问题从来都从多方面着手，一遇变化，就会随机应变，根据美国的利益来作出实用主义的选择，决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如今，美国文化大有风靡全球之势。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国移民组成的年轻国家，所谓“美国文化”并非某单一民族的文化。在美国的建国史上，世界众多的国家和民族都为美国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当代美国文化较易被很多国家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所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当然，我们对于美国文化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可一概肯定或全然否定。如今，美国文化在西德青少年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显示了美国政治和经济战略的成功，也体现了美国文化输出的成功。

联邦德国各地建立的青年活动中心非常出色，笔者曾在斯图加特参观过几处中心，这些中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有了中心，青年人在业余时间有了去处，他们聚在一起谈论时事，欣赏音乐，唱歌跳舞，学习绘画、印刷、木工等等。此外，中心还常为青年人举办演出会、展览会、假日旅游活动等等。尤其对于那些生活不宽裕的青年人来说，青年中心确实是一个访朋会友的最佳场所。

尽管联邦德国学术界对美国文化存有一定的戒心，但与美国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却很频繁。慕尼黑的青年研究所举办了不少次西欧青年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已发展成为东西方学术情报交流的中心之一。

瑞典的青少年研究

瑞典是一个社会福利高度发展的国家，原苏联有些学者曾研究“瑞典模式”问题。瑞典的社会学研究生机勃勃，国际社会学协会家庭研究委员会和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的主席都选上了瑞典社会学家。J·哈特曼博士曾来华访问过，他曾任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

瑞典的青少年研究非常活跃，青年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等问题，都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瑞典人的两性关系相当自由浪漫，就连美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新潮”有好些都是从瑞典人那儿学来的。因此，瑞典学者热中于研究青年人的婚恋观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也是瑞典学者重视的课题，近年来，有些学者研究当代社会的新科学技术对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影响，其成果引人注目。

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年轻人每当暑假快要结束时，就爱跟警察逗乐甚至引发冲突，这已有40年的传统。1987年8月，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发生严重的骚乱、纵火等事件，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注意。由于西方人重视夜生活，许多饭馆、舞厅、影剧院、咖啡厅都在夜晚继续营业，有些娱乐场所甚至通宵达旦地开放，但其中好些场所禁止18岁以下的年轻人观光，而参与闹事的大多数是14—17岁的青少年，他们觉得无处可去，便在广场、街道、公园与警察捉迷藏。

研究表明，斯德哥尔摩有大量国外移民，有些地区在校读书的孩子中有70%是外来移民，实际上，瑞典青少年已经变成了各国移民的子女，而父母对子女行为的影响程度又相当之低。70年代，瑞典非婚生孩子的比例已由22%上升到40%，这种社会现象

必将对当今和未来的青少年行为规范产生影响。由于妇女就业增加，促使人们的社会流动性增强。妇女就业还促使家庭关系多样化，孩子们生活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之中，例如，未婚家庭、离婚家庭、再婚家庭、各种单亲家庭、生身父母家庭、继父继母家庭等多种家庭类型必然会对儿童的社会化产生不同的影响。众所周知，妇女就业是工业化的产物，只有发达的科学技术才会促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加入社会化生产的劳动大军。尽管一些研究表明，母亲就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益，但大量妇女就业必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势必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如今，73.9%的瑞典青年认为选择职业是由自己决定的，只有10%的选择是由父母和亲属决定的。

研究还表明，电视、电影等新闻媒介的传播和影响也与青少年的闹事有关，新的影视技术对于促成独立自主的青年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教育事业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家长和学生都对学校教育不满，认为教学内容陈旧，学用结合不紧。为此，各公司企业不得不破费大量资金对青年职工进行职业教育。

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促使青年人早熟，使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较早拥有现代化的生活用品，例如，调查表明：1977—1985年间，大约有50%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耐用商品，91%的年轻人拥有自行车，86%拥有电唱机或录音机，77%拥有家俱，69%拥有体育器材，66%拥有照相机。这些现代化的日用商品开扩了青少年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父辈所未曾有过的一些问题。

新的科学技术已变成青少年之间加强交往的媒介，促使同龄群体的交往增多，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往减少。有趣的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初期发展阶段，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增多，这是亲子关系由传统型的父母支配转向现代型的子女自主所必经的阶段。但一当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现代化程度愈来愈高

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反而减少，这主要是因为父母逐渐顺应了潮流，他们因眼界开阔而不再苛求青年人，干脆想开了，让青年人自行其事，当然，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今，瑞典社会正面临这个新的难题，父母认为教育孩子是整个社会的事，而社会则认为教育孩子是父母应尽的义务。有些学者认为，这个争论必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原苏联的青少年研究

原苏联对青少年的世界观教育一直非常重视，原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创办了一个共青团高级学校科研中心，专门研究青少年的政治修养、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无神论教育等问题。

调查表明，48%的年轻人认为，没有必要对文学、诗歌创作·消费心理作出阶级分析。有关青年群体的研究表明，6%的非正式青年群体的活动脱离了政治，妨害了社会利益。

目前，原苏联曾开展教育体制改革，旨在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思想教育工作的形式，不少人认为，过去的一套已经过时，必须彻底改革才行。为此，不少研究人员对青少年的消费心理、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双重人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好些青少年问题都带有共同性，如丧失信仰的问题、损坏公共财产的问题等等。谈及损坏公共财产的问题，研究人员认为，青年人中出现用公家的显微镜钉钉子、把计算机用作烧茶水的底座等等怪事决非偶然，必须找出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原苏联社会学家将青少年问题分为永久性问题 and 现实性问题两大类型，永久性问题指的是青少年的孤独感和异常行为，现实性问题指传授知识、培养良好习惯、训练独立工作能力、解决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能力等等。早恋的问题呈现逐代提前的倾向，已引